



博士

► 上海市社會科學 ◀

文庫

華學誠 著

# 周秦漢晉方言研究史

ZHOU QIN HAN JIN FANGYAN YANJIU SHI

復旦大學出版社



博士

上海市社會科學

文庫

華學誠 著

# 周秦漢晉方言研究史

ZHOU QIN HAN JIN FANGYAN YANJIU SHI

復旦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周秦漢晉方言研究史 / 華學誠著. —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3. 3  
(上海市社會科學博士文庫)  
ISBN 7-309-03465-1

I. 周... II. 華... III. 漢語方言-研究-歷史-中國-先秦時代~晉代 IV. H17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2)第 091567 號

周秦漢晉方言研究史

華學誠 著

---

出版發行 復旦大學出版社

上海市國權路 579 號 郵編 200433

86-21-65118853(發行部); 86-21-65644348(郵購)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

責任編輯 陳麥青

裝幀設計 孫曙

總編輯 高若海

出品人 賀聖遂

---

印刷 江蘇句容市排印廠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8.5 插頁 1

字數 395 千

版次 2003 年 3 月第一版 2003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

書號 ISBN 7-309-03465-1 / H·673

定價 28.00 元

---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向復旦大學出版社發行部調換。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漢語方言學史研究領域的第一部斷代研究專著，以時間為經，以內容為緯，共列十章，約40萬字。

基于對漢語方言學史的宏觀把握，本書截取周秦漢晉時期作為討論對象，首次把該時期劃分為發軔階段、建立階段和古典傳統基本形成階段，并着力對這三個階段的特點、成果，以及各階段之間的演變發展關係等，作了全面、深入、系統的描寫和分析。本書新見迭出、創獲良多，魯國堯先生盛贊其為“後出轉精”之作。并且具有邏輯謹嚴、重點突出、資料翔實、分析精細、行文曉暢等特點。

# 上海市社會科學博士文庫編輯委員會

主任委員 殷一璀

副主任委員 郝鐵川

委 員 (以姓氏筆畫爲序)

王榮華	王鐵仙	方明倫
尹繼佐	朱敏彥	何勤華
施岳群	陳 昕	秦紹德
奚潔人	楊德廣	談 敏

## 魯 序

人老了，遠事記憶好，近事記憶差，這是醫學雜誌上的話，也的確如此。1955年秋天，我當時是大一學生，周祖謨先生教我們現代漢語語音課，在一次課上，他以字正腔圓的普通話引用了兩句名言：“前修未密，後出轉精。”周先生講話時的神情和那瀏亮的聲音如今依然在我的耳目之前。因為我從來沒聽說過這八個字，就在下課的時候走上前去問周先生，這才知道是章太炎先生的話。

“前修未密，後出轉精”，四十多年來我經常體味這兩句話，我認為，這兩句話至少是概括了整個學術史。太炎先生的話是真理。

如今放在我的書桌上的這本《周秦漢晉方言研究史》，我以為是應了太炎先生的“前修未密，後出轉精”八個字。這部書稿是華學誠同志的博士論文，現已獲准列入“第4批上海社會科學博士文庫”，並得到全額資助出版。學誠同志要我為他的專著作序，是因為我曾忝為他的博士論文的答辯委員，或許也因為我剛剛在《方言》雜誌今年第四期上發表了一篇《通泰方言研究史勝述》，他以為我對方言研究史有些瞭解。是的，我也曾經看過這方面的若干資料，在這些資料裏能稱得上漢語方言研究史的文字並不多，這個專門學術史也祇是到了二十世紀才真正開始建立，羅常培先生的《漢語方音研究小史》和何耿鏞先生的《漢語方言研究小史》是開創性的著作，“筭路藍縷，以啓山林”，功昭學史，至今仍是有價值的論著，仍是這一學科的學人必讀之作。但是惟其是草創之著，必有簡

略之憾，這也就給後繼者留有廣闊的空間，讓他們馳騁，使英雄不嫌無用武之地。

如果說羅、何等先生的論著是“前修未密”，那麼學誠這本書就是“後出轉精”。其“轉精”倒不主要是因為華著厚達數百頁，三十多萬字。說實在的，如今的書，幾乎無一不厚，可是很多書水分太多，就像一條剛剛從臉盆裏提起來的毛巾，這樣的書是絕對和“精”字不搭界的。

學誠的書，顧名思義，是研究自先秦至兩晉的方言研究史的，它就得囊括這一長時間內的有關方言記載、研究的各種史料，予以甄別、熔煉、分析，作出論斷，前人的觀點正確者闡發之，錯誤者駁正之，不足者補充之，還要能提出自己的新見，這新見還要有分量，如果是高見，就更難能可貴了，如此，這方才叫“轉精”。下面舉些例子來說。

郭璞的《方言注》是一部了不起的書，後世學者對它都很重視。王國維先生在《書郭注方言後》的一、二兩篇中發凡起例（見《觀堂集林》卷五），周祖謨先生對郭氏解釋詞語的一些重要條例也曾作過概括（見《方言校箋自序》）。但是王、周兩位先生都因未窮盡材料而難免疏漏。學誠同志則對《方言注》的全部材料進行了研究，從而在王、周兩位先生研究的基礎上又補充了二十條，其中音注類條例 9 條，釋義類條例 8 條，缺如類條例 3 條，同時還訂正了王國維漢晉之語音相近而有微別者先注正文音，後在今語下注今語音的說法（見本書頁 501—509）。

以往的研究者一般都認為《釋名》代表青徐方音，因而研究古齊魯方言的專家常常拿《釋名》中的材料來作例證，學誠同志則質

疑這一成說。其實《釋名》一書收有 1500 多條詞語，稱引有明確地域名稱的方言材料只有 40 條，也就是說，全書 97.4% 的詞語都不視為方言詞；書中方言地名共出現 47 次，其中青徐一帶的地名出現 28 次，可見明確稱引的方言材料也不專屬於青徐；劉熙著書的目的既然是探索百姓日稱詞語的“所以之意”，也就不會拋開通語雅言而祇從他的家鄉話中去尋求得名之由。學誠同志主要根據上述分析得出結論：“《釋名》從總體上來說是一部以東漢通語為研究對象的著作，它不是‘代表青徐方音’的書。”（頁 262）這一新說就把學誠帶進了爭鳴的行列。

《公羊傳》隱公五年“公曷為遠而觀魚，登來之也”句，何休注：“登讀言得來，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為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阮元的校勘記認為“登讀言得來”中誤衍“來”字。學誠同志細緻體會《公羊傳》原文和何注，採信了阮元的校勘意見，認為何氏所記齊語是指“得”讀同“登”音，並據此進行古音分析，而懷疑“‘登讀言得來’正是帶[l]的複輔音”的說法（頁 355）。

羅常培先生曾指出，《方言》裏所用的文字有好些祇有標音作用，並舉出三種情況來證明，其中第三種情況就是揚雄自己所造的字，所舉例字是訓愛的“憚”、訓哀的“悽”和訓好的“姪”（見《方言校箋羅序》）。這三個字都見於《方言》卷一，我們注意到學誠同志考證《方言》奇字所列的 296 字中就沒有“悽”字（頁 197）。這是因為在《方言》之前的文獻中已見該字的用例，比如成書早於《方言》150 多年的《淮南子》一書的《兵略》篇中就有這樣一句：“建鼓不出庫，諸侯莫不懼悽沮膽其處。”羅先生於此偶疏詳審，學誠同志沒有依



從是因為他已掌握了可以信據的材料。

學誠同志的書可稱道的地方很多，如揚雄“奇字”問題，是史實，也是學術史上的佳話，也是詩詞中的典故，學誠同志闢專章縷述，娓娓道來，令人稱快。我在這裏再着重講一條，就是他的窮盡式的研究方法。我第二遍讀他的書稿時，有意識地將若干數據摘出抄下，請看：

《爾雅》中出現方言詞的條目有 131 條，“《爾雅》中的方言詞，通過比較《爾雅》稍後出現的著作以及漢晉注疏資料和出土文獻，共考出 211 個。”（頁 60）其中單純詞 195 個，合成詞 16 個（頁 63）。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看該書中的《爾雅》方言詞在漢代 12 個方言區中的分佈情況統計表，如我感興趣的吳越方言區就有 27 個方言詞（頁 79）。

揚雄《方言》共記載了 1284 個詞，其中單音節詞 979 個，複音詞 305 個（頁 170）。《方言》中的“奇字”被學誠考得 296 個（頁 197），最後推定包含有揚雄所造之字的字量為 132 個（頁 210）。

劉熙《釋名》中有明確方言地域的材料共 40 條（頁 256—260），涉及地名 19 個，共出現 47 次，其中青徐一帶 28 次，兗冀一帶 8 次，荆豫一帶 7 次，其他地區 4 次（頁 261）。

許慎《說文》涉及地名 73 個，共出現 194 次（頁 300）；其中楚語 50 餘次，秦語 45 次，齊語 33 次，周語 20 次，汝南話 17 次，等等（頁 301）。

王逸《楚辭章句》涉及方言詞的有 22 條，其中 2 條為秦方言詞，餘為楚方言詞（頁 328）；楚地特有詞 14 個（頁 331），楚語音變詞 6 個（頁 335）。

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引方言詞 30 條，其中齊魯方言詞 26 個(頁 341)；屬於詞彙內容的有 21 條，共 23 個詞，其中名詞 10 個，動詞 10 個，形容詞 2 個，副詞 1 個(頁 344)；涉及方音的材料 2 條(頁 354)，涉及方言語法的材料 3 條(頁 356)，按，後者很重要，因為在中國古代文獻中，方言語法的材料罕見。

東漢末大儒鄭玄遍注群經，從現存的鄭玄三禮注和毛詩箋及其他輯佚書中，可得其方言詞 71 條，涉及地名 30 多個(頁 361)；其中標有“今”字的材料 19 條(頁 362)；齊魯一帶的詞彙 24 條，方音材料 19 條(頁 365)；楚越一帶的詞彙 7 條，方音材料 7 條(頁 377)；周秦一帶的詞彙 6 條，方音材料 8 條(頁 381)；燕冀一帶的詞彙 3 條，方音材料 5 條(頁 385)。

高誘《呂氏春秋注》和《淮南子注》中的方言材料共涉及到 25 個地名，這些地名共出現 84 次(頁 393)。其中楚淮方言詞 20 條，方音材料 13 條(頁 394)；幽冀方言詞 10 個(頁 403)，方音材料 7 條(頁 405—406)；青兗方言詞 9 個(頁 407)，方音材料 3 條(頁 409)；周秦方言詞 10 個(頁 410)。

從輯本中獲得的三國時期的方言材料 50 餘條，其中漢語方言地名共出現 54 次，各地區地名出現的數量比為：西南地區 5.6%，長江以南 20.4%，長江以北 74%(頁 417—418)。

從輯本中獲得的兩晉時期的方言材料 45 條，其中漢語方言地名共出現 52 次，它們主要集中在兩個地區，長江以北地區的地名出現 19 次，佔 36.5%，長江以南地區的地名出現 31 次，佔 60%(頁 427—428)。

陸璣的《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在 51 條當中引方言 80 次(頁

436),其中幽州地區 23 次,青徐兗地區 18 次,豫冀地區 12 次,荆揚地區 12 次,關西益州地區 9 次,其他地區 6 次(頁 442—443)。

郭璞《穆天子傳注》中的方言材料有 5 條,《山海經注》中的方言材料有 9 條(頁 450—451);《爾雅注》中引《方言》材料 19 條(頁 452—453),引晉代方言 157 條(頁 453—463);《方言注》中引晉代方言 93 條(頁 466—474)。上列四書中共引晉代方言 264 條;其中江東地區的地名出現了 173 次,佔 65.28%;南部地區的地名出現 22 次,佔 8.3%;西部地區的地名出現 31 次,佔 11.7%;中部地區的地名出現 15 次,佔 5.6%;東部地區的地名出現 17 次,佔 6.4%;北部地區的地名出現 7 次,佔 2.64%(頁 474—475)。把江東地區和南部地區的地名出現次數加在一起有 195 次,佔 73.59%(頁 475)。郭璞所引晉代方言材料中共有 271 個詞語,其中單音詞 152 個,佔 56.09%,複音詞 119 個,佔 43.91%(頁 490)。複音詞中有 5 個三音節的,1 個四音節的(頁 490);其他 113 個雙音節的詞,單純詞佔 31.86%;合成詞中偏正結構的佔 71.43%,並列結構的佔 11.69%,動賓、動補結構的佔 3.9%,附加式的佔 12.99%(頁 496—497)。

以上除了一則是概數以外,其餘都精確到個位數。

我之所以不憚煩地鈔錄華著的這麼多數據,是因為這些數字散在書中,要找時實在麻煩,把它們撮錄出來,利我自己,也利讀者諸君;之所以同時注上書中頁碼,是為了同道們復按查核。

我十分贊賞學誠同志的這種窮盡式的研究法。窮盡式自然比例舉式高明,這是任何學人周知的事實,無庸論證。當然也會有些課題不能使用窮盡式,自當別論。而坊間大量學術性著作卻喜歡

采用例舉式而摒棄窮盡式，為什麼？窮盡式要花大力氣，下死工夫，不是幾個月或者半年、一年能成功的。當今急功近利，無事不欲速成，怎能耐得住冷寂？忍得了煩難？讓我們來簡單地瞭解一下學誠同志研究方言研究史的歷程：他自 1986 年起開始研究揚雄《方言》，於今十有五年矣，他執著，他堅韌，他奔着一個目標。與本領域有關的論文他寫了二十多篇，共 30 多萬字。有堅實的基礎才能建成大廈，以上的那些統計數字都是一件一件的建築預製件。我以為，窮盡式的研究法得出的結論、觀點，顛撲難破，能經得住時間的考驗而長期地存在，我相信，同意這看法的人一定不少。

我若干年前曾和一位史學界的朋友交談，這位歷史學家說，研究明清史的學者，史料是窮盡不了的，因為冷不丁會從什麼地方，或什麼收藏家那裏冒出某個史料甚或一批史料。後來我研究宋代音韻史和宋代語言學史時發現，研究宋代也難以窮盡史料。至於上古、中古，傳世文獻則是可以用窮盡的。學誠同志的書是方言研究史中的斷代史，研究的時段是從先秦到兩晉，因此文獻資料自然是可以窮盡的。學誠走的是窮盡資料的路子，方向明，路子對，坐了冷板凳，下了死工夫，所以他這本著作能“後出轉精”。如果學誠不採用窮盡式的研究法呢？今年前些時候，報紙上有兩個熱點，都是關於影響中國二十世紀歷史甚鉅的張學良將軍的，一是他的 101 歲誕辰的慶祝活動，一是隨後不久張將軍逝世的消息。為這兩件事報紙上發表了許多文章，其中有一段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其言深刻。歷史學者唐德剛對張學良講：“您如果不發動西安事變，您就什麼也不是，一個軍閥而已。”我模仿唐先生的話說：“已經到了二十一世紀，華學誠出版研究先秦漢晉方言研究史的著作，如

果不採用窮盡法，就什麼也不是。”只有採用了窮盡法，他才有可能跟“後出轉精”四個字對上號。

華學誠同志研究先秦至兩晉的方言研究史，努力窮盡了傳世文獻。我還注意到他也曾利用過出土資料，書中有兩處這樣的例證：一是考證《爾雅》中的方言詞時，他利用了楚和秦的簡帛文字（頁 56—57）；一是考證《方言》中的“奇字”時，他使用了甲、金、簡、印、碑刻等文字（頁 200—204）。這是值得嘉許的。我想向學誠同志提一條建議，如今地不愛寶，大量出土資料不斷涌現，譬如近年刊佈的竹簡材料主要有：尹灣漢簡（1997）、郭店楚簡（1998）、九店楚簡（2000）、周家臺秦簡（2001）、三國吳簡（2001）。本月 12 日，《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第一卷出版首發式隆重舉行，取得轟動效應，這批竹簡共 1200 餘枚，辨識文字 35 000 多個。近若干年發現的大批簡帛中有没有方言資料？這就需要進一步探究，我希望學誠同志繼續追求，使這本書真正窮盡了現時所有的相關資料。當然一本書的成功不是僅僅靠最大限度地佔有資料，同時也得在學術的深度和廣度上肯下功夫。

末了兒，但不是不重要的，至少我以為。由對學誠同志的這本著作的議論我想推拓開去談論兩種研究方法的問題，當然也與學風問題不無關係。我經常注意觀察學術歷史和學術動態，似乎這半個世紀在漢語的研究方面，學界逐漸形成了兩種不同的研究方法。根據一個、幾個或稍多的個案，在某個理論框架下，一步一步地向前推繹，導出一兩個甚或一系列的帶有前瞻性的提法，高者更能提出某種理論。另一種研究法則是擁有豐富的高誠信度的語言或方言資源，爬羅了大量的歷史文獻資料，甚至使用窮盡的方法，

歸納之，分析之，既然立足於扎實的基礎，得出的結論則堅而難拔。當然這種兩分法是就其大體而言，並非壁壘分明，有些專家能兼而具之，是之謂大家。我以為，半個世紀以來，形成了這兩種研究方法，是不同的學術“生態環境”造成的，學人既然走做學問的道路，怎能不努力適應各自的環境？“適者生存”嘛！因而使用了不同的研究法，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因此都應該得到承認和尊重。究其實，這兩種研究法都是各揚其長，這話說了，討人歡喜；但是我也要說，這同時是各避其短，也許少數學人聽了不高興。似乎存在着這樣的現象，當然是個別的：此把彼看作鄉下土包子，採取俯視的態度；而彼則視此為西門大官人的花拳繡腿，算不得過硬工夫。平心而論，人世間沒有沒有缺點的事物，兩種研究法，兩類學者，各有其長，各有其短，借用當前報章上的用語說，是“互補性很強”。正確的態度應該是，兼容並包，彼此平視對方，不應該俯視，也不要仰視，應該提倡“取（人之）長，補（己之）短”。由接觸，而溝通，而互敬，而交流，而合作，而整合，以達於交融，我以為這是我們應由而且必由的康衢大道。

以上所言，是耶？非耶？請學誠和諸同道評論。

好了，就此打住。

**魯國堯**

2001年12月29日夜於隨園北鄰

## 胡 序

搞學術的青年常做創新的夢。要把這創新的夢變成活生生的現實，需要付出長期的艱苦勞動。這個道理，似乎人人皆知，卻非人人都辦得到。而華學誠君，是做到了，有他的著作《周秦漢晉方言研究史》為證。

方言研究史是語言學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依照傳統的看法，中國古代語言學史着重敘述文字、音韻、訓詁等學科發展的歷史，而方言研究史原為訓詁學史的一個分支，因此，幾乎所有中國語言學史的著作都對方言研究頗為重視，可又難講詳盡。敘述方言研究史的難點在古代。而一到了現當代，那敘述的格局就改觀了：方言調查與研究，不僅成為語言學園地上的一門“顯學”，而且從世界語言研究看，它還是我國的一門可與古文字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研究並列的優勢學科（王力《我對語言科學研究工作的意見》）。隨着我國方言調查與研究的蓬勃發展，一個關於中國古代方言研究史的撰寫任務，便落在一位富有學術敏感的青年的身上。華君早在1990年撰成的“歷代《方言》注家述評”（為劉君惠等《揚雄方言研究》一書第三編），就已經勾勒出我國古代方言研究的大體輪廓。從1990年到《周秦漢晉方言研究史》的定稿，他足足奮鬥了十一個春秋。真可說是“十年辛苦不尋常”哪！

這部著作確實“不尋常”，從史料的拓寬、方法的革新，或立論的創造上看，這部著作都頗有新意。在目前研究古代方言及其歷

史的有關論著中，當以這部著作最好。好就好在率先詳盡地原原本本地敘述了從三代至魏晉期間方言研究的發展歷史。如果說漢語古代方言學史可分上、下編，那麼，這部著作其實就是漢語古代方言學史的上編了。我們期望作者繼續保持那種“韌性戰鬥”的精神，再接再厲，去完成更爲難寫的下編，好讓人們對漢語古代方言研究的歷程，有一個全面的完整的認識，以之作爲當今方言研究的歷史借鑒。

**胡奇光**

2001年12月26日於復旦大學



## 李 序

語言文字是全社會的公器。語言從誕生那天起，通與俗就一直處於相互交變之中；文字也是這樣，所謂通語文字與方俗文字在任何歷史時期也都處於相互交變之中。正因為如此，漢語發展史和漢語文字發展史的建構如果偏離了這種交變關係的考察，那祇能是一堆表層上某些數據的統計材料罷了。即使總結出幾條原則，那也只能是盲人摸象，難免以偏概全。

漢語言文字發展到了漢代，已趨鼎盛時期，《爾雅》、《方言》、《說文解字》的相繼問世，正說明通與俗之間的這種關係。此後，代有新著問世，客觀上勾勒出這種交變關係的傳承和發展面貌。只是在學術觀念上人們始終重正通而輕方俗罷了。二十世紀中期，在為祖國語言的純潔健康而鬥爭的召喚之下，始雙管齊下，學術領域出現了語言文字研究正通與方俗並駕齊驅的局面，普通話與方言調查成績卓著，為推進社會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以方言調查而言，在語音、詞彙乃至語法方面成績斐然，這是有目共睹的，而方俗語用字方面卻仍滯後不逮，這主要表現在方言本字方面的問題。漢語與記錄漢語的文字之間存在着一種極為特殊的表示與被表示的關係。如果一味依照音素文字的法式而動輒來上個同音替代，勢必置人們於雲裏霧裏。比方說，北方某些方言中，把“真厲害”說成“真 ga · gu”，有部專收方俗語的詞典則直用“嘎古”二字。如果不拋開漢字涉義來考察，“嘎”與“古”無論如何同“厲害”一詞